

论“听觉政治”何以可能^{*}

——听觉感知的符码化运作、权力规训及治理逻辑

祁 程

摘 要 当代以数字技术为基石的声音技术媒介的快速发展，既推动了“听觉媒介”从单一方式向多向度、场景化方向演进，也促使哲学文化基调发生“听觉转向”，使其成为社会公共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阈中，听觉与政治之间势必产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联结，加之社会化主体的听觉能力又与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紧密相关，这为“听觉政治”论题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听觉政治”有其特有的演进逻辑和发展轨迹，听觉符码的隐形权力可以延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使听觉成为“身体—权力关系”这一权力话语方式中的指示符和传感器。在现代政治生活的表达规则及话语游戏中，听觉层面的声音配置被嵌入现代性的治理方式之中，它遵照可听性与不可听性相互交织的听觉伦理，体现为一种否定之否定性征的听觉治理逻辑。“听觉政治”的演进乃至整个听觉历史的书写，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感性认知方式及生存状态变革的历史进程。在唯物史观方法论原则下讨论“‘听觉政治’何以可能”这一议题，可以为听觉感知政治化和听觉治理的哲学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听觉政治” 感知 权力运作 批判

中图分类号 B0-0

感知问题是哲学史上重要的理论研究对象，传统形而上学的阐释路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向、现象学视域的研究范型均从不同维度探讨了感知生成的文化和政治意蕴。当代思想界在倡导“重返日常生活感性经验”的同时，突破

^{*}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听觉政治理论研究”（编号 AHSKY2022D012）的阶段成果。

原有的感知主体的情感叙事，将感知问题与政治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联系起来，尝试为日常感性生活提供一套符合当代感知特性的微观政治批判系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阈中的“感知”具有丰富的社会属性，视其为复杂且多样化的社会历史性存在。在数字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突破“视觉中心主义”的“听觉转向”日渐成为学界聚焦的理论话语。“听觉转向”的首倡者韦尔施（W. Welsch）提出了“听觉文化”革命的宏大构想，认为高扬听觉意味着应当以声学的思想逻辑对待世界，明确“我们迄至今日的主要被视觉所主导的文化，正在转化成为听觉文化”（韦尔施，第 209 页）。可以说，“听觉转向”指向一种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逻辑，显现为逻各斯去声化的过程。

随着以数字技术为基石的声音技术媒介的快速发展，听觉不断与技术、资本、权力等现代性内容相互融通，导致各类政治表征及其实践充盈了听觉元素，听觉成为政治运作的内生性力量。这无疑给听觉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既要尊重传统听觉感知研究的基本范式，又要激发“听觉转向”的哲学方法论自觉。不论是听觉的政治化倾向及其现代治理，还是现代政治的听觉感知化取向，都在逐步衍生出全新的“听觉政治”问题路向，极大地拓展了文化研究与社会批判的问题域。“听觉政治”在抗衡“视觉中心主义”这一文化思潮中曲折演进，并在新型声音技术的助推下完成了听觉领域的现代叙事，其具有相对独立的话语运作和表达机制；一旦政治权力通过相应的运作手段介入听觉感知，促发政治生活中的听觉操控和听觉治理，听觉便会以区隔社会身份的政治技术面貌加固与政治的链接。对上述问题的关照和思考，构成开展“听觉政治”可行性研究的前提。本文尝试在唯物史观方法论原则下讨论“‘听觉政治’何以可能”这一命题：在以往听觉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厘清听觉文化的思想发展脉络，辨析不同文化研究理路下对听觉的单一文化批判的限度，以期对听觉感知政治化和听觉治理的哲学研究提供参考。

一 视觉中心主义文化传统下的听觉转向

依托“感官”这一与世界联结的直接通道，人类形成了对世界的独特体验。而听觉作为有别于视觉的重要感觉经验，在人类思想史上却长期遭遇轻视与弹压。声音是人类最早、最原始的传播媒介之一，听觉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且曾一度高于视觉。个体的听觉体验的产生经历了一系列复杂过程，尚未出生的胎体就可以直接捕捉到外界的声音刺激。以听觉为主导的口头语言是人类交往的重要工具，经由生产实践的中介形成了鲜明的口语文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方式的拓新，口头表达已无法充分展示人类思维的丰富性及复杂程度，加之声音尚未能借助技术处理得以有效保存，具有相当程度的即瞬性，由此文字、图像的优势逐渐彰显，进而确立了以视觉为中心的传播渠道。视觉被默认为具有至上性的感官

体验,眼睛在感官系统中逐步获得“垄断”地位。

所谓“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并如何理解所看之物的方式,其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多样特性和表现样式。随着大量新型科技介质的运用及传播媒介的扩充,视觉中心主义依然在西方社会生活中掌握思想主流,人们深陷景观化与图像化的社会牢笼而无计可施。在视觉中心主义的“操控”下,“看”以一种异化的方式感知与把握世界,个体试图以被动观看者的形象调动与平衡感官却显无力,其他感官被迫“搁置”,视觉组织起一种具有社会规范性的视觉秩序,现代性生存体验被窄化为视觉化的行动范式,丰富的世界被把握为图像。可见,视觉中心主义事实上已经常态化为视觉霸权,它通过高强度视觉刺激(如短视频、广告)垄断人们的注意力资源,这种单向传播模式给人类正确自如地把握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视觉中心地位的奠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时期。“感官”在古希腊时期呈现出鲜明的等级制。视觉作为高级感觉,眼睛作为理智型的认知通道,能够提供认知世界的经验材料,于是便从人的整体感觉经验中分化而出,具有了相对于其他感官的优先性。虽然听觉也获得了高级感觉的地位,但与视觉相比仍无法直接与灵魂相连——因为即便听觉与理智、理性勾连,也不能提供足够丰富的客观感性材料。另外,视觉对于身体经验的感受度和卷入度相对较低,往往与所把握的外界事物保持间距,不需要通过接触来卷入他物之中。赫拉克利特非常重视视觉经验的重要性,认为眼睛比耳朵更可靠。柏拉图指出最大福气的通道来自视觉感官,虽然他遵循恩师苏格拉底的教诲,认为不应把认识真理的路径寄托在感觉经验上,但感觉经验作为获取理念知识不可或缺的中介,尤其是占据优先地位的视觉,其最显著的功能就是为理念提供可供把握的对象——对象能够为理性所认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看”。在柏拉图的“洞穴说”中,视觉感官见证了洞穴之外作为纯粹之善的光的显现,成为求索真理之途中的合法见证者,视觉经验也成为绝对至上的在场认知途径。亚里士多德在《论感觉及其对象》一文中明确肯定了视觉在“五感”中的统摄地位^①,对视觉的偏重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更甚“在诸感觉中,尤其喜爱视觉。……比之于任何事情,我们也更喜欢观看。”(亚里士多德,2005年,第15页)普罗提诺亦从审美角度认为美主要是通过视觉来接受的。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反偶像崇拜运动一度如火如荼,视觉的中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然而,教父哲学为凸显上帝造物尤其是造光的神圣性,给予“光”以点亮真理、驱赶阴霾的至高功能,视觉充当了与这一历史性场景会面的见证者角色。在文艺复兴和后

^① 亚里士多德的“五感”包括触觉、嗅觉、味觉、听觉和视觉。他认为视觉在本然意义上必然与生存相关联,能够直达心灵,且最有可能认识共同的感知对象。(参见亚里士多德,1992年,第98—112页)

蒙运动中,“可见性”的隐喻^①被抬高至无以复加的程度,视觉系统的知觉性能得以充分展现。

视觉文化作为现代性文化的主流形态,其对机械复制技术与媒介传播效应的作用仍在持续,图像充斥一切的势头仍在升温,诸多思想家提示人们要警惕视觉刺激带来的异化后果。首先,个体思维活动中的分辨能力下降乃至消散。琳琅满目的机械复制产品大行其道,胁迫人们不断调用视觉感官与之相适应,人们原有的主动性感受能力被躁动焦虑的社会健忘症所取代,构建起一种伪主体性的现代人身份。其次,可视化产品的大批量生产,使得现代性的观看方式变得愈加暴力和疯狂。近代自然科学借助视觉经验的至上原则,在与神性体验相抗争并获得胜利的同时,带来了主体性的张扬和认知方式的标准化。视觉以自有的系统性逻辑组织和编排出符合工具理性原则的世界图景,并赋予其结构的完整性和精密性。视觉系统所打造的影像景观主要依托图像和文字等视觉介质来传达景观社会的繁荣景象,而被掩盖于其后的则是图像泛滥驱动下的消费主义乱象,人们难以摆脱视觉权力的全方位规训,从而陷入对视觉图像的情性依赖及迷幻欲望之中。再次,电子拟真在消费社会成为主导性生产模式,真实与形象、正品与复制品、真像与拟像的界限越发模糊。在数字场景与技术程序操持下制造出的虚拟影像突破了人们对原有世界的认知模式,在场的幻觉显得更加精确、清晰、高效和简洁。视觉中心主义借助消费社会的异化逻辑,强化了一套适合符号话语逻辑的世界秩序,在视觉符号的加持下这一带有后现代性特征的文化霸权更为稳固。最后,视觉图像以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建构模式在当代不断生成和演化,逐渐形成福柯(M. Foucault)所说的“凝视的政治”,即一套带有“永恒的权力与快感的涌流”(Foucault, p. 45)的权力话语机制。原有政治系统的传统暴力形式被视觉监控的新型权力装置所取代,“大他者”^②规训着个体自身的欲望、情感和意志力,视觉成为新社会场景下权力生产秩序的践行者

① 文艺复兴的“可见性隐喻”主要以文艺理念的革新为手段,通过光影、透视、人体描绘等技法革新,以透视法则重构空间权力,以人体解剖挑战神造论,以世俗光影取代神圣光辉,使人的主体性力量得以凸显,实现了对神权遮蔽的“祛魅”与人性觉醒的“显形”。启蒙运动的“可见性隐喻”主要体现在“理性之光”对蒙昧和专制的驱散意象上,它将理性具象化为阳光或火炬,强调其穿透认知迷雾的能力。这一隐喻体现了当时思想家的批判逻辑和变革诉求。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M. Merleau-Ponty)则颠覆了理性启蒙的“光喻霸权”,首次系统提出了“可见性”的哲学概念,构建了以“可见性”为核心的知觉现象学体系,认为“可见性”包含着隐性的不可见结构,其本性就是把不在场的知觉潜在场域呈现出来,“不可见”乃是“可见性”的构成性背景。(参见梅洛-庞蒂,2007年,第84—86页;2008年,第312—313页)

② “大他者”是拉康(J. Lacan)哲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指由语言、社会规范、文化传统等构成的符号秩序体系,主体通过认同这一体系获得社会身份,但同时被其限制和塑造。(参见Lacan, p. 276)

和支配者。更多的他者权力在想象性的政治话语中源源不断地被再生产，更多个体在他者的观看下自动调整行为模式和认知方式，无处逃遁却又不得不小心谨慎地满足视觉规训的技术要求。

在西方思想史中，视觉中心主义的哲学文化传统不断进入现代哲学家的批判视野。尼采作为西方现代哲学的先驱，以“肉身化的视觉”批判了仅将视觉作为主导性的理性认知器官的思维方式。他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所设计的“纯粹理性”“绝对智慧”“认知身体”一类的概念“总是要求有一只常人无法想象的眼睛，总是要求这只眼睛完全没有方向感”。（参见尼采，第96页）然而，视觉如果被设定为一种抽象的感官经验，就不具备真正的透视性；它必须与具有审美成分的身体状态相关联，以避免因诸多社会符号的干扰所带来的形式化。费尔巴哈基于对基督教的批判，认为视觉影像在宗教异化过程中篡夺了人在世界构造逻辑中的主导地位，即“影像胜过实物”（费尔巴哈，第20页），且在生产生活领域确证了自身的虚假主体性，导致人的无限性与有限性不断趋于分裂。本雅明（W. Benjamin）作为现代西方视觉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以巴黎为样本展开都市景观分析。他通过对拱廊街动态化的视觉幻景及其机械复制装置的批判，揭示了视觉何以被列为现代性都市文化生活的显著标识，批判了视觉消费受众“只看而不去听的人要……远比只听而不去看的人来得不安”（本雅明，第44页）的迷恋又焦灼的矛盾心态，以完成对视觉形象的祛魅。海德格尔基于存在主义视阈，从形而上学层面批判了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将理念当作视觉把握的对象的做法，认为这意味着将存在者的存在视作被直观到的东西，以致将对世界的整体把握方式归于“世界图像”，即“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之被表象状态（Vorgestelltheit）中被寻求和发现的”（海德格尔，1997年，第86页）；而真理与存在的显现方式是语言的“道说”，听者应以包容的姿态使其内化为自身。德波（G. Debord）借助列斐伏尔（H. Lefebvre）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洞察到景观生产作为主要生产活动向以视觉为先导的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认为正是由于视觉景观的庞大堆积使得影像成为现实生活的主导力量，“真实的世界被优于这一世界的影像的精选品所取代”（德波，第13页）。另外，景观社会通过视觉化的处理将意识转化为虚假景象，从心理和欲望结构来催眠和调动观众，进而达成非暴力的隐形文化霸权。波德里亚（J. Baudrillard，亦译为“鲍德里亚”）透过基督教的反偶像崇拜传统，指出偶像化的视觉图像本质上不是图像，而是十分完美的拟像；视觉符号化的产物通过无尽的复制与相互影响，其踏足过的每一处都带有编码痕迹，在仿造、生产之后，“仿真是目前这个受代码支配的阶段的主要模式”（波德里亚，第67页）。即是说，在拟真的生成中所编织出的视觉幻象网络，这一“超真实”的精心构建逐步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福柯吸收了拉康对监狱、精神病院等“全景敞视主义”场所加以审视的凝视理论，从社会权力视角批判了视觉暴力在生活中的肆意扩张，认为“权力应该是可见的

但又是无法确知的”(福柯,第217页),这种二元统一体的机制使得权力在可见空间内,借助覆盖一切的凝视达到绝对统治的效果。雅各比(F. H. Jacobi)通过分析希腊传统和犹太传统这两种异质性文明,将“谛听”作为视觉图像批判的主要方式,认为“耳朵不像眼睛,它们不能徘徊也不能闭合”(雅各比,第181页),以此贬抑过度图像化的做法,进而对抗依照丰富色彩构图的图像权力打造的视觉化乌托邦空间。可见,尽管视觉中心主义与图像崇拜随着历史进展愈演愈烈,但现代哲学家对它的批判和反拨也越发深刻。

视觉在人类的认知逻辑中往往具有主动权,视觉霸权或多或少地干预了其他感官的认知经验,且会对其深度认知与思维结构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今天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以视觉范式为核心确立起来的,这种知识结构的弊病就在于它严重忽略了我们的听觉。’(路文彬,第61页)这导致听觉认知往往以视觉化的形式展开,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理解也多以图像化的方式予以记录和表达。即使在视觉中心主义传统中学者亦将视与听并置处理,但从认识论和社会哲学的角度看,两者在哲学机理与主体存在维度仍呈现出显著差异,这为听觉转向的发生提供了一定的契机。首先,视觉作为远距型感官,在不考虑中介物的前提下,能够透过一定的空间视距反复把握和审视对象;而基于声音的动态效果,听觉往往是融合型器官,需要不断适应空间距离来捕捉和把握声音。其次,视觉作为间离型感官注重区分存在(being)与实在(reality),通过刻意制造距离感来产生分离化的对象化认知,多呈现为个体性的行为表达;而听觉则有意消解存在与实在的区别,更为注重感知者与发声者的声音形式、听觉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多呈现为敞开式的社会性表达。再次,视觉对象的相对稳定性保证了视觉达及事物本身的客观性,其在哲学传统中多与理智、认知科学相联结;而听觉对象的相对流动性经常造成声音符号处于“灭失”状态,需要“谛听”的想象来保证听觉的信息统合,其在哲学传统中多与非理性、宗教信仰相关联,往往也展现出更多的创造性可能。‘聆听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在我们聆听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也在不知不觉地重塑着对象,依循我们自己的意志丰满着对象。至于观看,却是一个被动消费的过程,对象的清晰与具体令我们的想象压根无从插足。’(同上,第64页)最后,在听觉文化的表征作用下,听觉主体的“谛听”将听觉对象与内在自我相容纳,更易于形成与他者超感性的灵魂交互和精神共鸣,其存在的显现方式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显示、让显现、让看和听”(海德格尔,2004年,第251页),以达到对存在本身理解的动态发生性;而视觉主体则在传统视觉文化的干预下,不自觉地将视觉对象进行二元对立式的处理,这往往会无意识地造成“看”与“被看”的视觉暴力,较难以包容的姿态使他者内化为自身。

随着信息技术的拓新与传播方式的多元化,感知对象的动态效果、发声者与接收者的广泛互动性、口语文本的流动性传播等,都昭示着听觉转向及其哲学研究的

可能性,修复、回归与提升人类听觉经验的力量已是大势所趋。这里所谓的听觉转向,既不是为了突出听觉感官的独特地位,也不是仅关注声音的形式制作和物理意义,而是形成视觉管道与听觉管道的辩证结合以及感官的自如平衡。恩格斯曾主张在识别视听官能差异性的基础上考察两者的内在联系,认为“视觉和听觉二者所感知的都是波动”,由之“说明这些只有用不同的感官才能感受的不同属性,揭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恰好是科学的任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497—498页)这一包含了何以在听、何者在听、因何而听等多个层次的学理架构,更为侧重听觉经验塑造的可能性,体现了后工业时代人们的良好初衷。在有关听觉的研究进展中,研究者们一方面秉持一种审慎的辩证立场,对视觉与听觉在西方思想史上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现象加以淡化处理;另一方面则坚决反对不加反思地使用“反视觉主义”(antivisualism)这一概念(参见 Novak and Sakakeeny, p. 196),并试图进入跨学科领域来安放两者。^①总之,无论学者们采取何种方式切入听觉的哲学研究,听觉转向已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并在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中展现了其独特的现实意蕴。

二 “听觉政治”的内涵与演进轨迹

听觉作为人类这一特殊感知主体所具有的典型感知能力,是感性经验不断社会化的产物。马克思指出,生命体在感知结构中具有主体地位,听觉感知仰赖于社会化人类的感知素养,“人的耳朵与野性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0页)。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感知所处的客观历史条件,认为感知能力的培养必须在相应的感知活动中进行,“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同上,第190页)。这些观点在矫正过度依赖视觉文化现象的同时,也凸显出听觉与政治的交互逻辑,意味着人们的感知形式、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及文化消费心理均处于深刻变动之中。阿甘本(G. Agamben)曾在反思形而上学主体是否没有实体的纯粹界限时感叹“言说着的人类能够和那个位于‘那个说我的人’之外的某物相连吗?”(阿甘本,第109页)听觉主体通过把握社会化身体感官的感觉经验和认知维度,生成了丰富多样的感官运作功能,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结构中参与知识和权力的运作,并由此演化成为一种具有独异性政治生成机制的社会性要素。听觉与政治的勾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联结,社会化主体的听觉能力和认

^① 韦尔施就曾指认,视觉主导的感知文化正在发生一定的听觉转向。尽管他竭力勾勒“听觉文化”革命的宏大叙事,但仍对此感到不安,认为包括视觉中心主义在内,任何以高级感官为基础形成的单一感知模式都应当受到质疑。(参见韦尔施,第186—190页)

知结构同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包括认知模式、人类生存方式、技术进展、文化差异、群体特质、权力规训等）紧密相联，这为“听觉政治”论题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

何谓“听觉政治”？本文认为，“听觉政治”乃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以声音媒介为主要载体，通过日常生活的听觉感性经验积累，重视听觉感知的生成，依托听觉感官的认知和创造而形成的政治表征、建构机制及其政治实践。“听觉政治”强调从听觉维度入手探查感性经验的社会历史流变，以听觉形式呈现听觉经验的政治表征，通过考察声音媒介的功能效用及技术逻辑去发掘听觉感性的政治性生成因素，在此基础上揭示日常生活中听觉现象背后的政治行为和行动策略，探讨听觉体验变迁所揭示的个体文化心理的转变与生存状态的更迭，直至展开对人类文明的反思和警醒。从听觉文化历史的总体联系中，我们可以揭示当代“听觉政治”及其社会历史进程的内在规律。那么，“听觉政治”何以可能？本文认为，这一论题所要思考的问题包括“听觉政治”是如何在社会历史中演进的，其具有怎样的话语运作和表达机制，政治权力是如何介入听觉感知的，政治生活中的听觉治理如何展开，等等。

某种意义上，当代社会权力是在“观看的政治”转向“听觉政治”的建构过程中悄然生成的，其内化并渗透于日常生活结构的视听逻辑与符号体系之中。恩格斯十分强调感知器官的功能效用，但同时认为这种感知能力并不限于感官本身，而是在生产劳动中外界事物介入人们的感知器官后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与德国生理学家缪勒（J. P. Müller）所言的“神经特殊能量”^①划清了理论界限。恩格斯指出，感知在调节人的行为能力的同时，反过来也要由人的行为能力所检验，即依循事物的特性行事。“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感性知觉是否正确便受到准确无误的检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06页）听觉感知积极参与政治实践及其权力运作，往往具有政治表征的社会功能。“社会中的常规听觉环境作为社会生产生活的标尺，从中能够显示出社会发展的多重趋势。”（Schafer, p. 7）正是基于前文所述的视与听之间的性征差异，这一套由听觉介入的权力运作模式与视觉亦存在显著区别。第一，基于听觉的融合效果，现代权力借助于采用联觉运行特征的现代声音技术媒介，不断适应听觉主体对于知觉整体化发展的内在需求，塑造出由诸感官同步打造的非线性、去中心化的虚幻空间效果。第二，基于声音的流变特点，人们即便通过操控技术手段也难

^① 缪勒认为，由于各种感觉神经均具有各自特殊的能量，它们由此产生相对应的感觉，如听神经受到刺激而产生听觉；感觉是由各自感官的神经特殊能量所决定的，与客观世界无关。“神经特殊能量学说”只强调感觉的主观性，忽视了它的客观性，这明显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主张的一切感觉最终来源于物质世界背道而驰。（参见《普通心理学（第6版）》，第78页）

以在很长时间内精准固定听觉对象。然而，这种在历史中长久的不在场状态一旦被政治力量所激活，便能够获得相对固定的空间，呈现一种集体在场的社会景象。第三，基于听觉具有的开放性和社会性，政治权力往往通过数字化声音的互动和共享，塑造特定社群甚至全体成员的意识形态，进而导致不同形式的社会关系被编码分析和训练。第四，基于听觉主体的超感性和对存在的可理解性，其政治实践更倾向于支持差异，对新语言、符码和公共器具展开批判性审视，甚至形成某种共同体，以对抗现代听觉经验带来的听觉退化及私人化的文化压抑。可以说，听觉社会化的经验方式超越了传统的心理图式，在形式多样的听觉媒介的作用下不断进行塑造和书写，建构起一套与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的表达机制；反之，听觉亦在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改写和重塑。

在近代科学发展之前，古老传统中的“声音”往往被视作生者与语言的结合之地，用声音传递的召唤（或意会）成为有语言的生命存在的凸显形式。在阿甘本看来，古希腊哲学家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将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力图把握生者与语言之间、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结合关系。（参见阿甘本，第89页）“声音”往往依托信仰、宗教或迷信而产生某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教会或世俗统治者往往借助钟声、礼乐等声音工具施行规训，对信徒或社会公众的社会心理产生影响，各类宗教仪式和礼乐文化成为权力结构的体现方式。概言之，通过听觉感知的内化作用，实现对民众的心理感化、社会教化和情感维系，这既可以在客观上形成社会的凝聚效应，也可以衍化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

随着现代文化工业的兴起，“倾听”这一固化的感知模式被逐渐“生产”出来，甚至成建制地形成了一种声音文化工业。这一新型的文化工业装置包含了声音的生产、控制、传输、接受等诸环节，‘受到政治、技术、资本以及审美的形塑并构成一种听觉经验的社会互动’（郭小平，第40页）。伴随着无线电等手段的大规模运用，听觉技术“在城市休闲、工作和公共空间中广泛存在，使无线电迅速‘本土化’进入家庭生活的常规历史叙事变得复杂”（Birdsall，p. 223）。听觉信息由技术手段进行编码，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时空限制。这一编码方式在声音被听觉感官接收之前，就已经作为制作完成的给定性程序附着在听觉信息上，声音的振动与技术加工的结合，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信息感知体验。虽然象声词以其特有的意义表征赋予了声音更为持久的历史广度（超脱于其自身持续的时间），但是声音物性形态的真正凝结仍然依赖于现代技术对声音的复刻和录制。声音逐渐脱离其原有的肉身，获得了一种物性的独立存在形式。听觉感知往往被声音编码所制约，形成一种具有非现场的空间幻觉，而这一脱离原有稳定时空束缚的新空间形态，又生产出文化媒介生产活动所需要的新现场感。广播、电视一开始作为新型听觉文化媒介的出场，‘其特点呈现出主张‘倾听权’与公众普遍担心其成为公共噪音之间的张力关系’（同上，p. 223）。国家机器还会通过声音的强力传递来增加宣教的效果。

果,把声音通过强制力作用于公众,悄然拉近私人空间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距离。具言之,不断生成的声音艺术和声音装置,“利用声音来表达物理空间,创造空间表达声音形式的可能性”(Oddey, p. 162),听觉感知由此便被纳入了社会公共空间的领地。声音与发声器官、发声空间土壤的分离,使得现代文化工业能够对声音进行符合特定权力要求的加工、重组和改造,使其更为符合现代社会标准的倾听需要。

在声音媒介进一步进入乃至干预社会交往活动的过程中,其自身也成为社会化的重要环节,不得不服从于符合社会化需要的规训。相对于视觉沟通的“点对点”形式,听觉交互成为一种公开的“点对面”传播,能够做到形式上一视同仁。这种“听者众”的社会化传播方式,“已隐约涉及听觉沟通对人类社会架构的塑形”。(参见傅修延,第59页)掌握声音媒介的人,往往是掌握实际社会权力的人,他们有较为充分的主客观条件占有媒介资源,通过控制或影响有声媒介,传播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规范和社会规则,传布调控社会发展进程的倾向性话语信息,以期获取客观的社会回报或达成某些特定的政治目的。在获得声音媒介资源的同时,这些社会角色还具有较为成熟的媒介运用能力,善于整合声音、文字、图像等多种文化符号来表达特定立场(或观点),呈现反映特定政治认同的叙事方式。简言之,话语生产贯穿于听觉主体的声音符号建构之中,权力控制也逐步渗透到听觉身体感官的功能发挥之中。

三 听觉符码化运作与隐形权力表达机制

“听觉政治”经历了一个漫长又富有个性的历史演进过程。需要追问的是,它是依凭何种话语运作和表达机制得以生成的?从语言学的认识论层面来看,声音这一听觉符码通过从日常使用的符号进入理性思辨的理论视阈,从而获得了不同于意指对象标记的丰富谓指呈现。

听觉符码中的声音与意义紧密结合,赋予了听觉印象的叠加效应。索绪尔(F. Saussure)认为,语言是由对声音、形象加以区分所得的种种差异性符号而构成的,“究其本质,语言的词音根本不具声音意义”(Saussure, p. 164)。也就是说,声音不单作为索绪尔意义上的音响形象而存在,还显示出不同于单纯表象的感觉明证色彩;声音是音响形象(能指)与概念(所指)的联想性统一,是两者的结合体。音响形象与概念在语言系统中相互成就,概念于其中获得了意义,音响形象则在其中转换为与声音物质性特征相区分的表意要素。

声音符号的意义表达在上述叠加效应的基础上,往往又同话语权力链接在一起。霍尔(S. Hall)认为,听觉符号的意指内容是作为政治表征形式的话语运作的一部分,“符号学途径关心表征如何运作”(霍尔,“导言”第9页)。依照符号

学的理解,听觉符号的基本功能就是为了表征意义。而在符号学之外,声音符码的意义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在社会生活中,声音传递的听觉信号活动均是巴特(R. Barthes)所言的赋予意义的符码行动,即“对于人来讲……对于空间的占有也是带声响的”(巴特,2005年,第252页)。可以说,每一个带有意义的听觉符码都是具有生产性意义的新型文本。这一文本不仅在语言系统内部构成其意义,在语言规则和结构框架内被理解和阐述,而且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化不断地丰富其意义效果,以至听觉实践中传递的思想、情感和信念等也成为听觉符码行动过程中的意义表征。一旦人们的听觉感知被符号编码,声音信息的接收就不再限于局部的经验感知,每个听觉能指符号都尽可能地传达其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属性。声音的意指实践超越了原有的语言系统和次生的符号神话系统,在历史文化系统中不断建构出带有政治表征意味的听觉方式。

声音符码的隐形权力还能够延展到各个社会活动领域,从而形成符号权力。符号权力作为一种隐蔽流动、难以察觉的权力装置,具有现时性、重构性、隐蔽性和可转换性的特征。电影理论先驱希翁(M. Chion)指出,“在我们的听觉场中,永远存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成分”(希翁,第185页)。符号权力建构出来的表意系统不仅能够塑造某种特定的权力秩序,甚至能够重构社会实践和权力秩序,形成一种政治权力合法化的软性力量。布迪厄(P. Bourdieu)和帕斯隆(J. -C. Passeron)同样强调符号的社会功能,认为符号权力具有塑造不同符号化感知判断的能力,整个教育或规训体制下的社会化行为“无形中均成为一种符号暴力”(Bourdieu and Passeron, p. 5)。声音符码能够从多个层面完成社会秩序的重构和社会阶层的划定,从而保证符号编码(包括听觉符号在内)是在隐形的统治阶级权力机制运行过程中被生产和分配的,人们的感知系统均一定程度受制于体现统治逻辑的符号暴力:只有服从于声音文本等符码装置中的暴力感知信息,才能获得解码的可能性。视觉人类学研究者英戈尔德(T. Ingold)通过考察听觉的能动性问题,反对把声音作为纯粹的现存客体,认为“我们听到的其实非声音,正如我们看到的也非光线”(Ingold, p. 10),声音与光线一样,是一系列被加工后的媒介的感知物。通常情况下,没有经过系统性编码训练的人群只能被动服膺于听觉符码的权力规训机制,而熟悉编码程序规则的人只有基于反复的符码化接收训练,才有可能达到解码的目的。

听觉符号权力正在改写现代统治运作的模式,即由福柯意义上的身体的惩戒控制逐渐转向符号权力的暴力操控。听觉符号权力将自身乃至整个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不断地“文化”化到人们的身体感知之中。在布迪厄那里,符号与权力的结盟完成了对符号资本的全面占有。表面看,符号资本带有不同于传统经济资本的超功利性色彩,它内化在各种社会文化场域中以满足自身的特殊利益追求,发挥着将统治权力合法化的职能。以现代音乐的运作方式为例,其由于听觉编码的特殊性,

从而成为符号编码系统中的听觉文化符号类型。这一跃出康德先验美学规定的听觉符码，早已不再被设定为具有普遍效力的艺术共通感的纯粹审美形式，而是转换为现代隐形符号暴力的代表之一。音乐作品从制作之日起直到最后为听觉系统所接收，经过了多重的符号编码和制作，被听觉经验捕捉到的声音律动被总体性的权力话语所宰制，在一种理性化、符号化聆听世界的过程中进行意义编码，建构出一系列表征政治和文化的意义符码。大众原初听觉感性的审美表达，已在流行音乐机械化生产模式的复制和加工下，退化为简单的听觉快感。而音乐作为典型的象征符号资本则实现了与权力的合谋，用于表征其所意指的政治秩序。^①阿多诺认为，听觉符码与价值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音乐乃是“市民阶层……最具特性的艺术形式”（阿多诺，2017 年，第 135 页）。音乐这一最具表征性的媒介形式在统治权力机制操纵下的资本分配模式中，最终会累积成与之相对应的听觉审美节奏和情趣，归顺于资产阶级隐形的符号暴力，以致“在无线电广播和留声机无所不在的年代里人们已经普遍地遗忘了以往的音乐经验”（同上，第 133 页）。可以说，由阶层分化带来的资本分配的不平衡，导致了不同层次的听觉理解方式和接收机制，形成了等级化符码组织起来的听觉文化，进而制造出听觉文化实践的不平衡。能够对这一特殊象征符码进行解码的群体，自然可以占有这一符号资本；社会底层若要挑战现存社会的资本分配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其中一个可能的契机（或途径）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听觉符码元素的支配。

声音景观的权力话语构建起了总体性的空间布局，这象征着一种政治隐喻的完成。以音乐会为例，音乐厅的环形地理空间构成了权力运作下的声音景观，作为音乐接收者的听众、演奏者和指挥者、景观管理者之间体现了相对稳定的三元权力关系。按照阿尔都塞的文艺意识形态理论，艺术作品的审美形式应当产生一种间离效果，以使文艺文本的日常意识形态结构趋于离心化。即是说，所谓纯粹的、完美的文艺形式都不是均衡的，它力求使人们觉察到，在“这种表面的间离状态和‘异己’状态之中”（阿尔都塞，2010 年，第 162 页），一开始投入的意识形态元素与主导型的意识形态之间始终保持着距离。在现场的视听环境中，声音与视觉元素的融合发挥了独特的表意作用，它不同于纯视觉的媒介（如默片），‘如果去掉声音，视觉的现实主义性质就会遭到怀疑’（宋杰，第 15 页）。听众沉浸在声音景观之

^① 法国学者阿达利（J. Attali）从分析音乐的源起和历史流变、音乐市场的大众化和商品化性征来挖掘这一特殊的声音的生产关系全过程，展开了对声音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这一基础上，其后的研究者探讨了听觉感知的工业生产、声音商品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布展和流通，以重塑声音传媒技术对听觉的体验。（参见阿达利，第 111—115 页）声音技术媒介与声音市场资本的结盟深度介入了日常生活，加速了商品拜物教新形态的生成。由此，我们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阈下对听觉拜物教展开批判性研究。

中，往往并非其内心与音乐艺术本身的共鸣，而是在静默的约束性的权力关系中展现其特殊的身份形象，现场的音乐画面更多肯定了声音接收者的类型化形象，甚至参加音乐会就是一种阶级（或阶层）识别互认的分层文艺实践。阿达利认为音乐会的政治再现功能是一种整体景观“音乐会——再现社会的中心所在——在重复社会中仍然运作着。”（阿达利，第161页）音乐演奏在管理者的权力输出中，伴随指挥者的统一引导和演奏者的多重声音操弄，形成结构性的声音控制关系，以完成社会权力话语对这一声音类型的控制。整个听觉接收的过程，也是音乐的每一部分参与景观塑造的过程。

可以看出，声音符码这一权力运作场域所实现的并非单纯的感官融合，正是现代审美知觉尤其是听觉的建构实现了符码操纵模式的应用和转换。

四 听觉权力规训及建构性功能角色扮演

既然“听觉政治”的话语运作和表达机制通过声音符码的隐形权力得以建立，那么现代权力是如何介入听觉感知的，听觉又是以何种角色发挥作用并与之相伴相生的？“身体—权力关系”作为政治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指认了身体感知在权力系统中的建构性，当代政治运作的重要任务就是强化身体感知的社会功能。就此而言，听觉借助“身体”这一特殊的欲望—权力机器，成为“身体—权力关系”这一权力话语方式中无处不在的指示符和传感器。

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基点来自对人的生命的规范性考察。人的生命作为政治行动的首要条件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自然生命及其生物性特征落入国家权力的掌控之中，随之不断地向公共领域扩散，配合参与诸种权力机制的运行和建构，在堕入政治权力的谋划后实现微观身体的正常化，形成一种微观层面的生命政治治理。这种面向人的生命的治理策略，是能够不断作用于人自身的生物性权力技术。人类的身体虽源自自然，却往往通过非自然的状态来显示自身。现代哲学通过重新定义身体在哲学中的地位，开始赋予身体以本体意味的存在。作为实在的身体，通过“充任”声音传播这一特殊介质，体现自身作为听觉感知场的存在。身体既可以作为知觉者存在来接收外在的声音，又能够作为被听觉感知的对象来聆听自身：身体反复收集与回放他者的声音，以至听觉系统作为有机身体的特殊传感机制，当接收到的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元素被听觉感知捕获后，无法在身体感知系统中抽身而出、独立运行，而是逐渐在与多感官的统合与链接中完成再加工，塑造出具有全面性和历史感的感知经验。在这里，听觉显示的不仅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声音震动，还是带有社会性生成元素的个性化身体知觉。微观政治权力一旦进入听觉感知层面，听觉行为就极易转化成政治权力实践的一部分，被纳入更为广阔的政治话语实践空间。听觉这一被动行事的私密感知系统，却力图施加积极的行为方式，看似是

声音再加工的开放生产过程，实则被身体—权力的关系网络所吸纳，进而被“运用镇压或意识形态的双重方式‘发挥功能’”（阿尔都塞，2003年，第337页）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操纵。

听觉的权力规训史极为漫长。虽然听觉一开始是纯粹的自然身体行为，但随着私有制与社会分工的发展，开始出现人类社会早期特定的力量制约关系。政治权力的施展往往利用暴力刑罚的公开性，制造令听众惴惴不安的恐慌效果。这种恐怖感的营造是无形的匿名性惩戒，听觉接收者的惩罚音源既可能是受罚人撕心裂肺的呐喊，也可能是其对权力系统的控诉，抑或是其对法条及罪行施害人的忏悔，当然也可能是接收者作为直接见证方对受罚人的申讨。政治权力通过听觉感知这一系统化的处理方式来达到规训和驯服的目的，而听觉感知本身最终也作为身体系统的一部分被微观政治所掌控。福柯尤其重视听觉感知形式的历史性，认为听觉感知的塑造与身体密切相关：虽然身体的感知功能在权力体制的遏制下呈现出被动接收的感受性，但正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使得作为权力装置的身体能够参与到当代政治权力的运作之中。在书写权力话语的意义上，福柯认为听觉成为权力渗透到身体感知体验内部的重要经验场——“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听到隐约传来的战斗厮杀声。”（福柯，第340页）

身体—权力或知识—权力的历史演进，离不开听觉在权力布局中的功能发挥。进入现代社会，国家暴力机关施展规训、监视和侦听等权力技术，通过不同的权力机制运作塑造新的现代性身体。声音问题研究者谢弗（R. M. Schafer）揭示了声音占领空间甚至对人类身体的越界侵犯，并从这一现象中指认了一种声音帝国主义，即制造扰人音景而不受谴责的权力行为——“当声音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覆盖整个空间范围，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帝国主义。”（Schafer, p. 77）尤其是规范人类生物学特征的生命治理术，直接掌控着人类的生死、作息、健康等生命元素——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以总体性的方式隐匿在特殊的社会空间之中。一方面，被统治者的身体感知被有效剥离或侵蚀；另一方面，人类灵魂也被强行干预和驯化，以实现精神领域的所谓矫正。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医学、文化学等整合起来的跨学科规训技艺，使得对身体的干预越发潜移默化，权力驯化的方法和策略越发精细严密。听觉感知也不例外，同样被纳入权力规范与干预的结构化系统之中。福柯把边沁（J. Bentham）的“圆形监狱”^①视角拓宽为全景式现代监狱，但他的“全景敞视主义”本质上仍建立在视觉中心主导下的权力运作框架内。而实际上，听觉监

① 圆形监狱（panopticon）是英国哲学家边沁提出的一种监狱设计理念，其核心是通过中央瞭望塔对环形分布的囚室进行单向监视，利用心理威慑实现囚犯的自我规训。（参见 Bentham, p. 35）

控术和管理术不单适用于监狱高墙之内那种借用单人牢房通向中心塔的管道运作机制。无形的声音文本相对于有形化的图像符号，更是以隐喻形式参与到权力建构的全过程，且能够深层隐匿其规训的意义和目的。

接着，现代权力利用听觉符号这一权力工具，通过整合信息资源直接对主体感知进行加工和改造，并借助听觉技术建构更加广阔的听觉管控的政治空间。最为典型的是借助大众化的传播媒介对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加以教化与规范。法兰克福学派眼中的传统媒介形式，以单向度的传播渠道主宰信息发布、收集和整合的权力，发声器是在权力宰制下进行听觉训诫，形形色色的大众传媒只是统治权力的信息中介和执行工具，声音接收者被动接收一切声音信息，而无法实现与发声装置的自由互动。正如戈达尔（J. -L. Godard）所说，就今日的西方而言，任何政治策略的构成元素必然包含声音和影像，“如果影像仍继续存在，那么就存在着在声音之中竭力创造、经营影像的可能性”（麦凯波，第201页）。在声音装置的包围下，声音符号自上而下地被传递，以完成对人们民主生活的把控。即是说，意识形态的发声装置作为有限的公共资源被少数人占有，它通过对声音偏好的捕捉来掌控普通民众的听觉神经。随着听觉资源的生产愈益市场化，公共资源的实际占有者仍然能够借助权力掌握声音制造和传播的源头，一系列影响日常生活观念和行动的声音文本在市场中广泛流通，带有统治秩序的声音规范和情感认知逐渐生成和健全，造成了阿多诺所谓的现代意义上的“听的退化”。（参见阿多诺，2015年，第260页）

而后，公共设施 and 公共机构也成为带有暴力基因的声音控制者，通过听觉的重新塑造来打造合乎社会期望的公众形象和生活行为模式。博物馆、展馆、社区展示墙等公共设施不断挖掘和布展听觉感知的规范性，以期以民主化和开放性的形象指引公众生活。表面看，这些公共设施以无差别性平等开放给公众，声音的有效传播也意味着自由聆听，但实际上却参与了对社会大众身份的筛选和行为的约束。本尼特（T. Bennett）笔下的博物馆就是以安静如斯的声音环境条件来约束民众，使人们自觉遵守同传统权力规训相类似的声音规范；内部展品的陈列也遵循组织化的制度规范，仪式化的参观和展示路径迫使人们只能在有序的声音治理制度下调整自身的言语和行为。这些公共设施往往承担着文化区隔的社会职能，不仅对听众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养有明确的要求，而且对听众的经济能力有限制性的要求。巴特甚至认为，“众声音（众符码）的汇聚成为写作，成为一个立体空间”（巴特，2016年，第33页），听觉空间场域能够全方位地把控周围环境的变化及细节。当然，许多学者相信日常生活的常态将会被当下陌生而未知的社会稳定状态所延展，因为人们已经具备了“谛听”未知经验的能力。可就现实来看，我们自认为进入了所在之处，但“我们进入”这一重要事实却被排除在外。

基于对现代听觉感知规范性的构建，人们通过考察声音的社会功能乃至整个社会功能所形成的乐观见解，往往被证明是一种错觉：听觉行为系统与其他行为系统

在意识形态权力下彼此分割，听觉原本与解放、抵抗等现代政治主题的勾连被迫成为字面意义上的联系。声音的乌托邦构想转换为一种文字话语游戏，历史运动的现实实践不得不让步于未来预言性筹划的幻想。但是，符合政治权力性征的表达规则和话语游戏，又需要通过一定的听觉治理工具和逻辑程序加以落实，而在其中也可能形成某种反叛和颠覆。

五 听觉治理逻辑与双重民主话语呈现方式

现代权力完成了对听觉感知的塑造和再造。那么，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听觉治理应遵循怎样的逻辑展开呢？我们看到，尽管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不同形式的话语体系，并交织着一系列符合政治权力色彩的表达规则，但民主和平等终归成为“听觉政治”渴望达成的目标理念。听觉层面的声音配置承载着一种现代性的治理方式：一旦听觉感知介入政治生活，以“噪音”^①为代表的现代特殊话语便得以呈现，其中，声音缺席或在场的呈现方式表征了弱势群体在民主政治生活中的真实状态。总之，现代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可听性与不可听性的听觉伦理，是直接与权力分配相关联的；伴随着权力分配的声音在场或缺席，一种带有否定之否定性征的听觉治理逻辑逐渐生成。

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听觉主体同时也是发声主体，无论是所接收的声音还是发出的声音，除了声音语言本身所内蕴的语词和句法的意义之外，还在权力的平衡、把握与转换中获取更多的意义。仅就政治话语权力而言，它既体现了话语实施者的言说权力，也包含了言说话语被聆听的权力。所谓的形式平等往往体现在具体的言语行为上：在某种权力机制的运作下，只有当言说发声行为与聆听行为一并成为社会交往活动的表现形式的时候，聆听者与被聆听者的互动关系才能实现此种形式平等。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中，允诺自我之外的他者享有言说与被聆听的权力，承认对话行为中各自的话语权，往往只有在理想话语情境中才可能实现。如果剥夺了互动关系中他者的言说权力，也就意味着他被赋予了聆听的权力。平等的交往与对话行为奠基于言说权力本身的主宰性，这也是“听觉政治”中不同社会关系得以塑造的现实基础。

① 政治哲学中的“噪音”并非仅指物理层面的声音噪音，而是作为隐喻扩展到一种“非标准”的符号系统乃至行为模式；其表达形式具有典型的非规范性，往往通过非主流媒介进行传播和扩散，并形成对主流文化权力结构的显性挑战或隐性反叛。在文化研究领域，噪音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指人们在主流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外通过非传统表达形式传递信息、情感和价值观的文化实践。阿达利指出，“在噪音里我们可读出生命的符码、人际关系”，它既是“残留的非理性的庇护所”，也是“权力的工具和娱乐的形式”。（参见阿达利，第5页）

“民主”是听觉治理的理想情形之一，即所有社会成员都拥有发声的权利，也有平等掌控可听性与不可听性的权利，可以自由地表达对社会公共政策的立场和见解。正如帕纳贾（D. Panagia）所言，“话语的可听性对于考察政治生活的感知意义不容小觑”（Panagia, p. 46）。一般情况下，政治生活中的发声涉及的都是合理的利益诉求及时代表达，民主政治的发声本应是既喧嚣热闹又井然有序的，但实际情况是：并非所有的声音都能发出并加以传播，听觉感官有时扮演的是“聋人”角色。朗西埃（J. Rancière）把判定与甄别艺术真伪的秩序法则拓展至“听觉政治”领域，主张应在不同体制下合理分配对政治生活的发声机会，即所谓的“可感性分配”。他试图建立一种服务于政治秩序的规则，“对行为方式、存在方式和说话方式的分配加以界定”（Rancière, p. 29），预设一种“可听”与“不可听”相互分别的感性划分秩序，以适应于微观政治的感知辨识体制。可以看出，政治生活中施行的听觉治理，已将民主作为一种形式表征的治理形态；底层民众的发声被置于某种民主基调的感性配置中，其所展示出的和谐状态中的公共理性已被事先规定好传播的界限。这种听觉形式的平等，意味着高度和谐的韵律节奏的背后是权力机制的操控。总之，听觉规范性和一致性背后隐匿的是民主话语的隐形暴力，实质上揭示了“可听”与“不可听”之间的不平衡关系。

听觉治理的第一层逻辑在于，在听觉感知世界，噪音与普通声音本来形成了最基本的二元对立，但这种对立却使得噪音在既定的权力与知识的可感性分配模式下，成了“无分者”^①的身份识别标签。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分者”在听觉处置过程中受制于可感性的分配法则，他们被体制排挤在社会主流之外，往往被政治系统刻意遗漏且不被承认，承担了具有特定言说与听觉感知权利的社会角色。他们发声的实质恰恰在于发声的无效表达，这无疑是政治话语系统给他们划定的听觉盲区。他们的民主话语表达被视为动物性本能的聒噪，在主体准动物性声音装置下的宣泄中，完成了形式上的发声权利——噪音，这恰恰体现了现代民众普遍的、真实的政治生活境遇。由此可见，话语到底是由赋予既定社会普遍性意义的声音所促成，还是被定性为特定含义的噪音，不在于采用何种语法结构，也不在于施行何种通行语言规则，而在于政治权力采取何种分配方式。

听觉治理的第二层逻辑在于，本来被赋予了审美文化意蕴的听觉，在参与治理的进程中拥有了对象和工具的双重身份，在政治与审美交互的治理实践中建构起一套适应性的听觉感知结构，以整合噪音与普通声音的二元对立。民主的政治生活更强调感性治安，这一层面的政治等同于审美：在听觉文化制作的源头上，主要通过

^① 西方左翼学者朗西埃把被主流阶级所排挤的社会群体称作“无分者”。他在《歧义：政治与哲学》一书中说“正是由于无分者的存在，这些一无所有的全体，共同体才以一种政治性共同体存在。”（朗西埃，第23页）

制度审查和文本干预进行听觉管控；在听觉产品的流通中，主要通过设定声音技术标准、打造听觉传播平台装置、询唤声音消费受众主体等实现听觉治理的连贯性；在听觉消费中，主要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助推特定群体的文化霸权等进行听觉治理的审美实践。概言之，在“物化”听觉趣味的差异化行为中，各类听觉主体确证了自身的身份定位。现代权力通过打造与现行社会相适应的听觉共同体，加固对某类听觉情感的认同结构并匹配相应的感知秩序，力图使得声音世界趋于和谐一致。阿伦特（H. Arendt）指出，民主社会往往对民众的发声产生误认，那些与公共世界失去联系的“暴民”意味着“被不公正地排除在社会之外”（阿伦特，第431页），其社会结构中无根地位的特殊性，又被美化成上帝至高无上的普遍性。譬如，在资本主义现有权力关系失衡的局面下，听觉治理的民主状态实质上意味着伪民主、非民主的在场或理想听觉的缺席——缺席的是被治理机制加以清除且与和谐民主相对立的噪音。^①然而，当权者通过回溯底层民众声音传递的轨迹，发现实际发声者往往是政治生活的边缘者或多余者。现代西方左翼学者则从社会底层的叙事逻辑展开讨论，认为没有一种真正的民主社会是死寂无声的，即便无声的抗争作为革命斗争的特殊表现形式，也意味着“民主政治首当其冲乃是噪音政治”（Panagia, p. 48）。即是说，可以通过无声胜有声的力量，打破现有声音的和谐假象，从既往的沉默中孕育出新型的政治生活主体，在噪音和暴力的旗帜下捍卫民主的道路。

听觉治理的第三层逻辑在于，最初，真正的民主声音在民主生活的政治分配中被标记为一种声音的不可听性，而一旦之前那种无法听到（或难以捕捉到）的声音片段（或言语细节）开始对抗、挑战和冲击占据统治地位的声音秩序之时，也就意味着新型政治的出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听觉感知结构下，原先形成于不同听觉感知世界的简单对立，反而成为“无分者”唯一的特殊之处，并在此对立中被给予言说的虚假权利。对于“无分者”而言，想要共时性地表达对社会公共政策的意见建议成为一种奢求，如何定性“噪音”取决于“听觉政治”的掌控权。因为一旦这一掌控权被噪音发出者获得，那么原本所谓的噪音即可被看作话语来阐述或理解，之前那些当权者的发声很可能化为无意义的嚎叫或低喃。也就是说，如果发声者取得对噪音性质的界定权，其内在的听觉张力在一定条件下便会弱化权力掌控者的发声，那么，形式上的听觉感知的圆满和谐，就会在固有裂缝与差异的断裂处被破除。而且，即便不在场且无法言说的声音被指认为噪音而遭遇刻意抹除，它

① 现代国家对噪音环境的调控，成为其行使微观规制的显著手段。噪音褪去前现代社会仅具的自然意味，而与特定的政治对象尤其是底层群众关联密切，其本身作为差异符号起到标识与区隔的作用。数字噪音尤甚，当下对数字资本主义、数字意识形态的批判也与之密切相关。

也会内生出挑战主流听觉法则的勇气，且会在裂隙中尝试重新计算缺失的听觉感知图型，或试图在同一感知共同体中寻回暂时缺漏的部分。概言之，如果所谓噪音的发声者获得了政治主体性，也就意味着听觉感官装置获得了重置：一方面，他们热衷于社会权力分享的意志表达，在民主政治的权力分配游戏中成为反抗统治的先锋；另一方面，他们同原先那种普遍声音相抗争，以拒斥具有独占性的权威声音。

听觉治理的一般逻辑表明，虚假的形式发声权利往往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政治生活发声的可听性，会将噪音系统载入到整个社会之中，使其成为社会公共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预先建构起一套“听觉政治”话语权力体系；另一方面，政治生活发声的可听性与不可听性之间存在裂隙，就会触发由听觉感知不平衡带来的“听觉政治”变革。也就是说，由于新生的变革性声音不断地抵抗乃至击碎原有感知规则与秩序的统一性，导致新的听觉感知能力得以孵化和培育，并在新的感知主体化进程中不断显现出来。这有利于形成不同于以往的全新听觉共同体形象，继而重构原有的感知分配体制。马克思则将人类感知的全面解放的前提条件诉诸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和对政治权力的彻底改造，即“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0页）。这一“听觉政治”的根本性时代变革，也由此成为现代听觉治理的逻辑终点。可以说，当今时代的听觉治理逻辑遵循的是现代政治生活自我扬弃、破旧立新的路径，并在听觉感知世界反复不断的抗争张力中实现了“听觉政治”的革新和改造。

结 语

“听觉政治”论题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和发展轨迹，其演进乃至整个听觉历史的书写，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感性认知方式和生存状态变革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将听觉感知的生成过程与诸种政治表征及其功能性实践有机联系起来：一方面，“听觉政治”的认知历史与发生过程奠基于社会文化的持续发展和变革中；另一方面，听觉主体无法回避那种超越于普遍性经验、情感问题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性影响。“人声”这一听觉感知的关键符码被生产出来，其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再生产同社会发展演变同构的历史进程，在“听觉政治”符码系统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当代政治运作的独特生态下，听觉已不再作为单纯的感知经验而存在，而成为区隔阶层、身份以及社会属性的标志性隐喻手段，构建出一套微观社会治理和自我调控的政治技术规则。“听觉政治”也由此被纳入总体性的社会治理策略之中，衍生为把握日常感性生活的独特方式，积极参与政治权力的构建。其中的“政治”意蕴十分广泛，既包含可见的政治权力，也包含观念上层建筑层面的资源分配，还包含声音技术层面对听觉传播装置及话语方式的改造。听觉行为成为政治权力和意

意识形态渗透的载体,影响着社会控制和阶层划分,积极参与建构身份认同。可以说,“听觉政治”深刻揭示了感官经验与政治权力的深层关联,不仅突破了视觉主导的政治分析范式,而且丰富了听觉在社会空间感知营造与跨时空共同体整合中的效用。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阈出发推进“听觉政治”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听觉感知现象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政治运行机制。在“听觉政治”的话语体系建设中,我们应立足唯物史观,完成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批判性重建: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听觉异化状态,主动挑战由资本主导的听觉秩序,进而恢复人与声音的创造性关系以打破声音生产垄断,发掘听觉主体的创造性潜能以形成新的感觉共同体,设计自由聆听的声音策略以抵抗权力规训,不断推动社会的深层次变革。总之,“听觉政治”不仅旨在揭示听觉的符码化运作和权力规训机制,还旨在通过变革性的听觉实践重塑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并将人类解放的感官维度作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阿达利,2000年《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翁桂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阿多诺,2015年《论音乐中的拜物教特征与听的退化》,方德生译,载张一兵主编《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6辑)》,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17年《新音乐的哲学(第5版)》,曹俊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 阿尔都塞,2003年《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 2010年《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 阿甘本,2017年《我,眼睛,声音》,王立秋等译,漓江出版社。
- 阿伦特,2008年《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巴特,2005年《显义与晦义》,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 2016年《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本雅明,2017年《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波德里亚,2006年《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
- 德波,2006年《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费尔巴哈,1984年《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
- 福柯,2019年《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修订译本)》,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傅修延,2021年《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麦凯波,1999年《戈达尔:影像、声音与政治》,林宝元编译,湖南美术出版社。
- 郭小平,2019年《声音的政治:国家、市场与技术视域下的话筒工场》,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海德格尔,1997年《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04年《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修订译本)》,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
- 霍尔,2013年《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

- 朗西埃, 2015 年 《歧义: 政治与哲学》, 刘纪蕙等译, 西北大学出版社。
- 路文彬, 2007 年 《视觉时代的听觉细语: 20 世纪中国文学伦理问题研究》, 安徽教育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2009 年, 人民出版社。
- 梅洛-庞蒂, 2007 年 《眼与心》, 杨大春译, 商务印书馆。
- 2008 年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罗国祥译, 商务印书馆。
- 尼采, 1992 年 《论道德的谱系》, 周红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普通心理学 (第 6 版)》, 2023 年, 彭聃龄、陈宝国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宋杰, 2001 年 《视听语言——影像与声音》,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韦尔施, 2002 年 《重构美学》, 陆扬、张岩冰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希翁, 2013 年 《声音》, 张艾弓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雅各比, 2007 年 《不完美的图像: 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 姚建彬译, 新星出版社。
- 亚里士多德, 1992 年 《论感觉及其对象》, 载苗力田主编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 3 卷, 苗力田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5 年 《形而上学》, 李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Bentham, J. , 1995, *The Panopticon Writings*, M. Božović (ed.) , London: Verso.
- Birdsall, C. , 2017, “Interwar Fr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Auditory Culture”, in *The Senses and Society* 12 (2) .
- Bourdieu, P. and Passeron, J. -C. , 1990,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 Foucault, M. , 199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I: An Introduction)* , R. Hurley (ed.) ,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Ingold, T. , 2007, “Against Soundscape”, in A. Carlyle (ed.) , *Autumn Leaves*, Paris: Double Entendre.
- Lacan, J. , 1978, *Le Séminaire, Livre II: Le Moi Dans la Théorie de Freud et Dans la Technique de la Psychanalyse*, J. A. Miller (ed.) , Paris: Seuil.
- Novak, D. and Sakakeeny, M. , 2015, *Keywords in Sound*,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Oddey, A. , 2007, “The Art of Sound: Auditory Directions”, in *Re-Framing the Theatrical: Interdisciplinary Landscapes for Performanc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Panagia, D. , 2009, *The Political Life of Sens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Rancière, J. , 1999,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J. Rose (trans.)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aussure, F. , 1971,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C. Bally and A. Séchehayé (eds.) , Paris: Payot.
- Schafer, R. M. , 1977,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New York: Knopf.

(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贾红莲